

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

——缅怀严文明先生

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先驱

·李永城

严文明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设计者和领导者,在66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仰韶文化、文明起源、聚落考古、农业考古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生在北大讲授和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而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农业”的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浪潮,它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加速了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先生很早就指出,受地形构造、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中国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经济地理文化区: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区,长江流域和东南的稻作农业区和长城沿线、蒙新高原、东北北部、青藏高原的狩猎(渔猎)-采集文化、畜牧业文化区。这三个地区的文化既有差异性,也有统一性。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先生在中国农业考古,特别是稻作农业起源研究领域内的贡献做一简要回顾。

水稻是世界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也是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主要食粮,人类消耗卡路里总量的21%都来自水稻。因此,栽培稻的起源历来在农业、遗传学、植物学和考古学等领域备受重视。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亚洲栽培稻源于亚洲多年生野生稻(O.rufipogon)。其两个亚种分别为印度稻(indica)和日本稻(japonica),也称籼稻和粳稻。其他还有:印度阿萨姆-中国云南说;锡金-大吉岭说;泰国-东南亚说;中国“长江中游说”“华南说”“南岭说”等。

中国是水稻栽培大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地已发现相当一批水稻遗存,但学界一直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1981年,江西省社科院创办了《农业考古》杂志,先生在该杂志1982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

先生在文中强调,真正解决水稻的起源必须依靠考古学家手中的小铲。他通过梳理文献及长江下游-杭州湾、长江中游、珠江流域、云南、黄河流域及台湾、福建史前栽培稻遗存的考古发现,指出:1.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稻壳时代早、数量多,且有专业稻作农具,其稻作已远非初始状态,稻作出现时间应在距今7000年前。2.已发现的稻谷遗址均位于古湖泊沿岸和沼泽地带,当时种植的主要是水稻。3.稻、粳两个水稻亚种的起源除气候生态影响外,也不排除其他野生稻亲本的作用。4.中国栽培稻表现出从一个中心向四方发展的趋势。即从河姆渡遗址所在的杭州湾向外扩散,第一波抵长江下游近海地区(公元前4300-3700年)。第二波达两湖盆地(公元前3800-2900年)。第三波进入黄淮平原和粤北(公元前2900-2100年)。第四波扩展到长江上游、台湾、黄河下游及以北地区(商周时期)。已大致形成接近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

经过对比南亚、东南亚和日本等地发现的稻谷遗存,尚无一处早于河姆渡遗址。为此先生指出,以往将中国作为水稻次生栽培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文中先生用了很大篇幅讨论野生稻分布和栽培稻起源的关系。结论为:1.史前中国丰富的栽培稻集中在长江下游近海及杭州湾地区。2.历史时期在长江下游仍有很多野生稻,至今仍存有野生“浮稻”,可见那里是史前野生稻繁殖的重要区域。3.长江下游河湖沼泽水网密布,非常有利于野生稻的生态需求。

最后先生强调,鉴于河姆渡第四层出土水稻已是远离野生稻本体的形态。因此,要解决栽培稻的起源,还需努力寻找更早的栽培稻和野生稻标本。

1988-1989年,先生在中国和日本发表了一组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文章。其中《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补充了长江中下游及闽、台、四川等地新发现的栽培稻遗存。鉴于在湖北宜昌枝城北遗址和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有早到7000年前的稻作遗存,先生提出两点新认识:1.将长江中下游合并为稻作起源的中心。2.朝鲜和日本的栽培稻源于中国,最可能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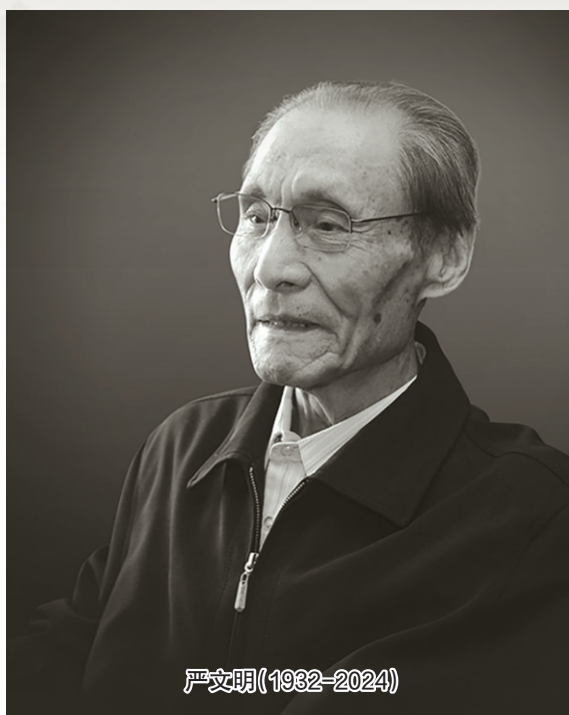
播途径为: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鉴于在朝鲜或日本的早期稻作农业遗址未见中国华南、江、浙或山东等地的史前文化因素,史前栽培稻经海路传入朝鲜或日本的可能性不大。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先生进一步深入思考了稻作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提出“边缘理论”。他指出,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发达,人类的食物需求量也较大。特别是那里四季分明,漫长的冬季食物匮乏,人类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寻找一种能长期储存,冬季可享用的食物,稻谷恰好符合这一需求。长江流域处在普通野生稻分布北缘,自然状态下生长数量不多,但因为上述原因迫切需要人工加以培植。在华南、东南与西南低纬度地区,植物生长茂盛,可食用的禽、兽和水生物很多,加上那里史前文化不发达、人口也不多,通过采集和渔猎基本能解决人们的食物需求。因此人工栽培谷物、增加食物的需求并不强烈,这也正是那里长期没有发生农业的缘由。先生提出的“边缘理论”与美国著名学者宾福德(L.Binford)的“边缘地带说”可谓异曲同工,但又略有区别。“边缘理论”是根据长江流域考古发现的实际总结出来的,是中国学者首次对农业起源进行深层次理论思考的典范,并被学术界广为接受。

1996年,先生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农耕与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将中国的稻作农业发展归纳为:萌芽期(公元前10000-7000年);初步发展期(公元前7000-5000年);兴盛期(公元前5000-3000年)。稻作农业向中国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传播是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发生的。

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和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先后发现距今9000年前的栽培稻遗存,充分证实先生提出“稻作农业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的先见之明。与此同时,先生还将稻作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结合,论述了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先导作用。

最后顺便提及,1993年,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德沃考古研究会(AFAR)合作开展了“赣东北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挖掘了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在1万年前的地层发现大量水稻植硅石;2006年,北京大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在澧县玉蟠遗址合作研究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这两个项目都是在先生领导下进行的,它们不仅深化了我国的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严文明(1932-2024)

如何通过田野工作获得聚落社会的资料将是今后考古方法论上的重大关键。所以自北庄考古伊始,先生就把目标旗帜鲜明地制订在全面揭露北庄史前村落上;围绕这个目标在技术方法上的摸索和建设,也从此成为北大田野考古的努力方向。时至今日,先生的聚落考古理念得到落地,业已形成了一套严谨且站得住的技术方法体系,而且是一个带有鲜明中国学术特色的方法体系,不但被贯彻在北大的田野考古中,还作为行业技术规范,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为中国考古学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在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积累上取得众多成果。在此基础上,苏秉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学说。这个学说一方面总结了对考古学文化演进动态趋势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根据对各地古代文化发展变化情势的归纳,提出了史前中国文化“满天星斗”式发展的历史观。而严文明先生则从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运动中进一步提炼出它们存在着一个“多元一体”或曰“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先生进而在其宏大的视野内论证了地处东亚的多元一体中国文化格局之形成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原因。又指出,这个既多元又不断趋向一体化的格局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趋势。“多元一体”说一经提出,立即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很快成为共识,成为当今学术界看待和理解中国历史的指导理论!对此,先生却非常谦虚地说,“我的这个看法,不过是秉承了苏先生的思想,又借鉴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而来,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一点成绩。”但对于学习和研究新石器考古的而言,我深知先生的观点对自己的震撼之大和启迪之深。

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促使学术界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古代文明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文明的问题。所以,随着这个问题的提出,中国考古学也开始了从主要研究课题到相关研究技术方法的全面转型。这期间,先生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在各种场合举办学术讲座,更是亲自主持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

古学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深入探究中国文明起源。但我要说的是,先生的贡献不止是这些具体而深刻的研究成果,更大的贡献是他为中国考古学这次重大转折发展做出的极具前瞻性的学术准备和规划。前述聚落考古田野工作方法的建设,为这场转折提供了得以复原古代社会的技术和资料的支撑,这是其一。先生的多元一体学说不仅仅是文化史层面上的理论,其意义更在于指出了在多元文化背后,各地史前社会演进过程中同样存在多元一体的内容,从而提出了在中国文明问题研究上的一个重要思路、方法,即不能只是把中国文明视为一个一般进化论式的过程,而更要开展对各地地方文明的个案研究。先生的这个思路,一方面对如何深化当下还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做一般过程式阐释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先生把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千变万化看作是深层社会多姿多彩演进内容在物质文化层面的衍射表达,从而把文化史的研究和古代社会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中国考古学也就没有重蹈西方新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断裂开来的覆辙,这是其二。最后一点是,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仰韶文化社会组织、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研究已成经典,早就为今天中国考古学古代社会的复原研究作出了示范。

严文明先生在他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站在学术前沿,是中国考古学的思想者,规划并引领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他不仅是我的、也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导师!在先生走后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这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对于我,对北大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而言,皆是如此!痛哉!哀哉!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形态的考察》,并组织了“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重大课题,完整论述了中国史前从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到城乡分化后以聚落群、中心聚落为代表的早期国家的演进过程,是系统探索史前社会演进的突破性成果。

利用墓葬和聚落材料研究史前社会,在严文明先生之前大都是采取民族志比较方法,1984年,张光直先生在北大开设“考古学六讲”时介绍的聚落考古也是这种路径。先生也有过这类比较研究,但他认为民族志材料只能作为辅证,真正落实还要看考古学资料本身的“内证”,这就需要摸索出史前墓葬、墓地和聚落的社会考古学方法。先生利用人口学方法分析仰韶文化墓葬,运用后来被称为“景观考古”和“家户考古”等方法分析仰韶文化聚落,研究的视野涉及了社群人口规模、婚姻形态、生产与消费、社会组织的规模与层级、所有制形式等多个方面,开创了史前聚落考古和社会考古的研究范例。与同时期欧洲社会考古学或者尤为重视聚落考古的北美考古学相比,先生的研究理念和研究路径更为前沿。

严文明先生虽然重视“方法”,但实际上从不拘泥于任何固化的“程式”,包括他自己曾经创设的范例或者提出过的设想。如若对先生的学术编年稍加留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的研究,从来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以事实(考古材料)为依据,也因此能在研究中不断推陈出新,示人以规范。先生在《丹凤集》首页题词说“学术有传承,发展靠创新。传承如根脉,创新是生命”。信哉斯言!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编者按】1958年,严文明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先生治学严谨、思想深邃,用一生叩问华夏大地的史前文明,成就卓越;他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领导者,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引领者,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的思想家,卓越的考古学教育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先生于2023年荣获“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考古学家。在这个暮春,严文明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本报特约先生弟子赵辉教授、张弛教授、李永城教授撰写文章,共同追忆严文明先生。

师恩如海

·赵辉

4月14日,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永远地离开了,离开了他的家人、他的学生和他为之付出了毕生的考古事业。先生的病来得突然。我在先生高烧被抑制住,病情稍微平稳且似乎向好的时候到院看望了先生。我告诉先生,现在病房之外桃李初开,和先生约定,出院后便一起到校园赏花。先生听了显得很高兴,谁知这竟成永诀!

初识先生,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课上。还是低年本科生的我,在当时自然是没有任何学术的判断力的,对新石器时代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严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但先生讲课时那严谨清晰的逻辑表达深深感动了我,我感觉自己在先生由浅入深娓娓道来之间,不知不觉地就踏进了新石器时代这片天地。从此就下了决心,追随先生!

先生平时不苟言笑,年轻学子见先生时常有怯意,以致先生有时会无可奈何地问:“这是否是我的姓氏给人造成的误会?”接触得多了就知道,先生其实是个温和敦厚的人。先生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即喜欢正面且和风细雨般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愿就不同意甚至错误观点进行争论。“是非曲直,自会有评说”——先生这么说。就是在闲谈时,先生也是评论

事,不对人。当然也有躲不开要议论人的时候,譬如先生的“仰韶文化研究”这门课,有相当部分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史,就不可避免地对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评价。但先生总是把这些人物放在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中具体分析,尤其强调他们在当时作出的前沿贡献,而对其不足和错误,则实事求是地指出,那更多的是受当时的学科水平所限,并非不可理解。例如对安特生有关甘肃彩陶六期的划分,先生的评价是:在当时,仅凭调查得来的材料就把甘肃彩陶准确划分出六组,而且除了把齐家组的年代位置放错了之外,其余五组的相对年代判断无误,这在当时委实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想起来,先生的为人态度,我没有效仿得来,但先生治学的方法,我自觉有几分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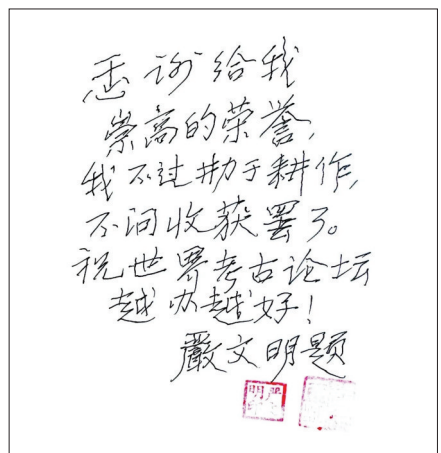
我的本科田野考古实习是在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实习期间,从发掘现场各种地层现象的判断到资料整理和编写报告,全程都是在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而每当在发掘现场见到先生往往仅凭一些蛛丝马迹就能准确分析、预判出地下的堆积状况,更是让我们暗自惊叹、钦佩。后来的田野考古实践多了我才明白,先生的洞察力全然是他在多年田野考古实践中总结积累的丰富经验的体现。掌握田野考古技能,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我的这个基础,是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事后才知道,杨家圈遗址的实习是先生最后一次全程带队指导的实习,我赶上了,何其幸哉!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这个学科得以产生的前提,也是考古学的基础。北大考古从一开始就把田野考古作为最核心的课程,对其非常重视并始终不渝。自打杨家圈实习之后,我参加了由先生策划布局的、开展在多地遗址上的田野教学实习或科研项目,屡有收获。如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的发现,就开拓了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重要课题等等。而在诸多收获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聚落考古的田野工作方法体系的建立。这个工作方法的建立,说来话长,大体上是先生主导的1982年山东长岛北庄遗址的发掘开始的。在对仰韶文化聚落形态所见史前社会的研究中,先生就察觉到

古研究主题的系统认识。百年来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在这两条途径上探索并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众多,但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有独立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见解,且都有方法或者方法论意义上的创见者,恐怕只有先生一人。

严文明先生的学术实践是从仰韶文化研究入手的。在文化历史研究方面,他从仰韶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析开始,渐次讨论整个仰韶文化的分期、类型、起源、发展阶段以及与环境文化的关系,后来集成为《仰韶文化研究》的壹、贰两部分。在这期间,先生还发表过多篇区域文化分析的文章,多收入《史前考古论集》,以及如《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等综合性文章。直至晚年主编《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发表,提出了中国文化、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瓣花朵”模式并发展为多元一体学说。这一学说替代了此前的种种种论说,被学术界乃至社会广泛接受,至今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指导性理论框架。

严文明先生在早期代表作《仰韶文化研究》前言中曾特意强调,“我的文章不只是就事论事,还应注意有关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他对仰韶文化研究提倡的方法,是从一个个遗址的分期入手,再依照地理小区归纳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再扩大到文化的分期和类型。在每个考古学文化都理



2023年12月,严文明先生被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授予“终身成就奖”后手书获奖感言

我对严文明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

·张弛

对我来说,严文明先生的病逝是十分突然的。此次先生因发烧入院,病情时好时坏,我也一直觉得他会像之前一样逐渐好起来,不料入院一月,病情加重,遽然离世。以先生九十寿辰时的身体状况来看,我以为他期颐可待,从未想过对教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想法。我个人追随先生学习和工作已有四十年,近年来发表过几篇关涉或直接评述他学术观点的文章,但都不是全面、系统性的考察,当然也未就这些文章的内容跟先生有过交流。现在再想请益,已不可得。

仅就学术研究而言,严文明先生虽然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成果名世,但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上也有建树,此外还旁及旧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等其他方向,短文难以系统回顾。这里就就先生建立的、独具特色的、对中国考古学贡献最著的史前考古学学术体系,谈谈我对先生学术思想的一点个人认识,并以此追念先生对我的教诲。

在2021年纪念中国考古学百年诞辰之际,我曾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研究主旨无非为“民族与革命”,反映在史前考古上的命题则是“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而史前考古“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这两种研究取向,正是由严文明先生提出来的、对中国史前考

清之后,再谈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过先生的文化历史研究不像一些研究者着重关注所谓器物“文化谱系”,而是还引入了生计经济、生产工具乃至墓葬习俗和聚落形态等多个维度,上举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的研究就是这样。为此,先生还对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国农业和畜牧业起源等生业和区域经济课题开展了专题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这篇大尺度的文章中,史前文化更是涵盖了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技术、生业、手工业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内容,这种“文化观”当然也可以比拟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成果大多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考古资料并不十分丰富的时期,在如此多视角上讨论问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强的综合研究能力。这也是先生的立论更令人信服、受众群体更为广泛的原因。

在社会历史研究论题上,严文明先生不仅仅关注了学界讨论较多的墓葬和墓地资料,发表了《横滨墓地试析》和《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与社会制度》等论文,而且还开创了聚落考古的途径,从分析姜寨仰韶文化早期村落入手(《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讨论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进而通盘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与社会(《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